

K A O G U X U E L I L U N

考古学理论

陈淳 / 编著

古



復旦大學出版社

考古学理论

陈淳 编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考古学理论/陈淳编著 一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8
ISBN 7-309-04032-5

I. 考… II. 陈… III. 考古学-高等学校-教材 IV K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46517 号

考古学理论

陈 淳 编著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118853(发行部) 86-21-65109143(邮购)

fupnet@ fudanpress com http://www fudanpress com

责任编辑 陈麦青

装帧设计 陈 萍

总 编 辑 高若海

出 品 人 贺圣遂

印 刷 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18 75

字 数 346 千

版 次 2004 年 8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3 000

书 号 ISBN 7-309-04032-5/K·130

定 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全面介绍考古学理论发展和现状的教科书,共分两部分,十七章。第一部分介绍考古学理论、思维与方法的沿革,第二部分介绍了当前考古学理论主要领域的进展和特点,是作者根据国外留学期间系统学习和掌握的知识综合编撰而成,力求反映学科的成就与发展方向。中国高等院校的考古学科专业训练,考古学理论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加上这门学科和国际学术主流疏离时间较长,造成许多方面的严重脱节和滞后。这本教材的编撰,可以弥补这方面的缺憾,有助于提高专业素质训练的水准。

本书论及的范围较为全面,并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置于国际学科发展的大背景中进行审视。过去半个世纪中,考古学的术语变得丰富而复杂,为了便于理解和学习,文字尽量通俗易懂,对新的专门术语做必要的解释。本书第一部分适于本科生的教学,第二部分适于研究生的训练,同时它也可作为考古学、文物学、博物馆学和古代史专业人士了解学科发展和提高学术水平的重要参考书。

前　　言

张光直在为《时间与传统》的中译本所写的序中谈到,《中国考古学年鉴》中根本没有“考古学理论”这个范畴,说明“理论”这件东西在当代中国的考古活动中没有什么地位^①。在为《中国文物报》所撰写的一篇题为“要是有个青年考古工作者来问道”的随笔中,张光直也提到,考古工作不是挖死人骨头,它是很复杂的社会人文科学^②。如果中国考古学对它的实践没有理论的指导和阐释,那么我们如何评价它的科学性?如果考古发现不重视从理论上来提高我们的科学认识,那么这门学科又意义何在?

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在当今中国的考古学界可能有很大的分歧,特别对于一辈子在田野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经验的学者,实践出真知是无可置疑的座右铭。这些学者通过毕生的努力,构建起过去不为人知的中国史前史,并增进了我们对历史的了解。出土的精美文物一次次引起社会的轰动和瞩目,文物精品的世界巡回展令国际友人叹为观止。在重大发现的光环里,考古学家被喜悦所陶醉,并会有一种巨大的成就感。

同样,社会公众也常将考古与发现地下的珍宝和失落的文明联系在一起,在媒体的渲染和炒作下,考古学家的工作被认为是通向浪漫和迷宫之旅,比如开启地下宫殿和宝藏、进入神秘的金字塔以及探寻沉入湖底的城堡。然而,只有为数不多的考古学家才能有幸从事这样的探险工作。大部分的考古发掘,找到的只不过是破碎的陶片和石器,以及古人废弃的生活垃圾。因此,英国考古学家皮戈特(S Piggott)将考古学称为是一门“研究垃圾的科学”。考古学家用他们毕生的精力来寻找、发现和研究远古人类丢弃的垃圾,并不是试图发现其中的珍宝,而是像侦探那样试图从这些远古社会的残留物中寻找各种信息。他们关心古代的人们如何生活,怎样思想,当时的社会和今天有什么不同,早期的社会又如何发展和演变……

① 张光直,序言。《时间与传统》,布鲁斯·坎格尔著,蒋祖棣、刘英译。北京 三联书店,1991 年,4 页。

② 张光直,要是有个青年考古工作者来问道。《考古人类学随笔》,北京:三联书店,1999 年,127 页。

考古学在 19 世纪兴起时确实是和挖宝与盗墓无异的工作,早期欧洲的考古发掘者并非是专家,而只不过是业余的爱好者或旅行家,他们将挖到的珍宝带走,或把它们变成私人的秘藏,或把它们陈列在博物馆里,很少考虑文物的背景和文化历史信息。当时的考古发掘也没有严格的规范,从现代考古学的要求来说是极其野蛮的,根本不考虑遗迹的保护和未来研究的需要。于是发掘也是毁灭的过程,文化遗产和考古资源的损失是无可估量的。

到了 20 世纪,考古学已经逐渐向一门严肃的学科发展,考古学家必须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现代考古学的基础已不是 19 世纪的那种探险和挖宝,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它已变成一门严谨和要求甚高的学科,有一套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过去,并且不断地处于更新与发展之中。

作为科学的考古学今天已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组成部分,既是我们了解自身发展的一个独特的窗口,又为其他人文与社会学科研究提供新的视野与信息。考古学研究的成果不但能增进我们对自身历史的了解,还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我们生存的这个星球上生态环境、气候和资源与我们自身发展的关系,从而能使我们从更长更广的时空中来研究我们当今与未来的世界。

由此可见,考古学不应当仅仅满足和局限于发现与补充历史,更不能停留在挖宝和寻找失落古迹的层次上,现代考古学已变成一门应用科学理论与方法来研究人类古代遗存的学科。考古学需要自己的理论方法,是因为考古学家观察的有关人类历史的物质证据是和文献完全不同的研究材料,而且这些材料由于保存的难易程度使得考古学家在利用它们来观察过去时,受到证据残缺不全的干扰与制约。这使得考古学家必须要像侦探一样,采用各种先进技术从那些杂乱和残缺不全的物品,如陶片、石器、动物骨骼或植物孢粉来提炼远古人类生存环境和适应方式的信息,并从理论上解读这些信息的文化历史意义。

从张光直对中国考古学的评价来看,中国考古学家迄今所做的大部分工作仍局限于所谓“干考古”。也就是说,学者们将这门学科的基础放在田野实践与考古发现上。我国一些考古权威杂志的宗旨也立足于刊登考古发现,将材料的积累看作是本学科最重要的任务。于是,在绝大多数大学的考古学课程中,介绍考古发现的内容以及如何“干考古”成为对学生最主要的基本训练。比如如何勘探,如何布方、划分层位与分辨遗迹,如何做精确的记录,以及如何分类和分期等等。

但是,现代考古学已经超出了这样一套纯技术的操作范畴,它不仅包括发现、排列和描述过去的遗存,同时也包括了解和解释过去发生的事情,并探究遗存与现象产生的原因。所以,考古学仅有一套完善的技术和方法是不够的,它还必须与一套解释考古遗存与现象的理论概念相关联。现代考古学理论的作用是

为考古学家提供一种科学框架和手段来透过现象看本质,对发生在过去的事情作出阐释。正如童恩正所言,考古发现不等于考古学,除了发掘材料之外,还要具备理论指导的科学性,研究方法的先进性和研究成果的独创性^①。

如果说传统考古学完全缺乏对材料的阐释也不尽外,面对发现的各种遗存与遗迹,考古学家也经常作出自己的判断与解释,但是这种判断和解释大都建立在学者个人的经验和常识性判断的基础之上,带有相当多的猜测成分。中国考古学还有一个误区,就是以为经验观察是不受任何理论影响的,只要我们不带成见地进行观察,那么经验知识的积累就可以上升为科学理论。

然而现代科学方法论认为,观察的感官识别并不表明你已辨认出了什么。客观描述的事实只是事物的表象,并非事物的本质和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科学研究活动的目的是要揭示隐藏在纷繁复杂现象背后的原因和规律。引导我们从事研究的不应是表象的观察,而是表象所反映的问题。如果观察到种种现象而不提出问题,那么这些现象无论被观察到多少次,仍然是未知的事实,并不会引起人们对它的研究,从而增进我们的认识。

英国考古学家约翰逊说,事实和现象是重要的,但是没有理论,它们不会吐露真言。考古学家和废铜烂铁收集者之间的区别在于,我们要用一套法则将那些事实和现象转化成对过去有意义的解释。过去和现在之间有一条鸿沟,需要考古学家建立一座连接的桥梁,这座桥梁就是用来阐释的理论与方法。否则,考古学就会倒退到“古物学”的时代,根据其本身特点来收集和整理器物,而不是将它们看作是了解过去的证据^②。由于对理论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在我国相当一部分考古学者的眼里,理论不过是一种“缺乏事实根据的空谈”。

中国考古学重实践轻理论的倾向在很大程度上与自己的历史学定位有很大的关系,在大部分中国学者的眼里,考古学是为历史学提供证据或以增补的方式来充实历史,于是长期以来编年学倾向成为主导考古研究的主流。有学者认为,建立和完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应当成为考古工作努力的主要方向。中国考古学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夏鼐也将考古学定位在历史学,把考古学和历史学看作是车的两轮和鸟的两翼不可偏废^③。

张光直对中国考古学漠视理论的现象作了分析,他认为中国传统史学本来就缺乏对历史理论的有系统的探讨,特别注重对客观史实的记叙,并利用对史实的选择和描述来表明历史学家对价值系统的主观判断。于是,在这种历史观里

① 童恩正 中国考古学五十年(1949—1979)。《汉学研究》,1994年12卷1期。

② Johnson M. *Archaeological Theory* London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9

③ 夏鼐,什么是考古学。《考古》,1984年1期。

发展起来的考古学,也就特别重视考古材料的获取和考证,而不信任主观的理论,常以为理论不过是一种成见^①。20世纪初五四运动带来的西学东渐,不仅使中国学者对古史记载的真伪提出质疑,而且对传统史学从主观判断来解释历史的治学方法发起挑战,提出了“历史学不是著史”,中国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深刻见解,对立足于史料考证和排比的历史观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然而这些对传统史学观的反思与批评,对当时从西方引入的考古学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反过来却使这门西学东渐的舶来品完全被国学所同化。与历史学不是著史,而是要用现代科学方法进行独立思考一样,科学考古学也不应当成为编史或证经补史的工具,而应当成为一门完全独立的学科。遗憾的是,中国考古学在过去的80年里一直以充当编史学的工具为己任,至今仍有许多考古学家将自己的发现能印证典籍看作是最有成就感的工作。

考古学与历史学研究关系密切,但是由于它也是一门以了解人类自身的学科而被视为人文学科的一部分。与历史学依赖文字的典籍不同,考古发现的材料并不直接告诉我们历史的故事,需要考古学家来弄懂他们的含义。从这个意义上,考古学更像是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家收集材料或证据,进行实验,提出解释现象因果关系的假设,然后从材料和证据的基础上加以检验,最后得出科学的结论。像自然科学家们通过努力来提供对自然界的客观认识一样,考古学家的工作也是努力要为我们提供一种已逝历史的真实图像。

显然,要用考古发现的材料来复原已逝的过去,单靠考古学家的经验和常识性解释是远远不够的。这是因为:

1. 考古研究不易将主体和客体分开。与大部分自然科学研究必须完全从外部去研究客体不同,考古学家在研究中可以完全介入到被观察的客体中去,凭自己主观的直觉来下结论。这就是皮亚杰所指出的,“人文科学以从事无数活动的人作为研究对象,而同时又由人的认识活动来思考,所以人文科学处于既把人作为主体又把人作为客体这样一个特殊的地位,这自然会引起一系列既特殊又困难的问题。”其中最明显的就是,人人都可以自认为是行家^②。

2. 常识类比所得出的结论常常难以检验。由于考古学家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常识来解释古代遗存或现象,而古代人类的思维和活动和现代人并不完全相同,因此这种凭常识性推理所得出的结论有可能存在很大的异数。如果一种现象有几种不同的可能性解释而无法予以验证,那么结论也就没有什么科学意义。如果有人对一种结论提出不同的看法,而研究者无法予以解释,那么这样的

① 张光直,序言。《时间与传统》,布鲁斯·坎格尔著,蒋祖棣、刘英译。北京 三联书店,1991年。

② 皮亚杰,《人文科学认识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

结论也难以令人信服。如果考古学家得出的一个结论无法被证实,那么这种看法只是一家之言而很难被看作是科学的结论。由于历史事件是无法重复而且难以进行实验,所以对考古学家的解释做科学的判定成为最为棘手的问题。我国考古界在评估一种观点的可信度时,常以学者的地位、经验和资历作为仲裁依据,这样得出的结论虽然都被冠以科学的名义,但是显然有悖于科学的本意。

3. 常识性类比在分析直观的器物或现象时往往行之有效,但是在分析非直观的因果关系时就难以胜任了。于是,大部分直观的考古研究往往深度有限,而且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然而,和其他探索性学科一样,考古研究的境界应当不满足于描述和罗列发现了什么东西,而是力求对研究对象产生的原因作出科学的阐释。

因此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以经验、常识和直觉思维的传统方法来处理复杂的科学问题已经完全不合时宜了,它不但限制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而且有可能使我们误入歧途。

张光直对考古学研究的几个相关方面作了说明,他说“资料”是研究历史的客观基础,“技术”是获取资料的途径,“方法”是研究资料的手段,“理论”是规律认识的总结以及指引具体研究的向导^①。由此可见,考古研究缺乏其中任何一项环节都是不完整的。特别是缺乏理论思考的考古学,不免出现研究目的不明,方法缺乏针对性,结论和解释经不起推敲、不成系统或迷惑混乱的特点。

中国考古学在从西方引入后的 80 年里,基本上是在缺乏理论的状态下运作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在 20 世纪上半叶西方考古学的理论仍未成熟,比如在威利(G R Willey)和萨布洛夫(J A Sabloff)所著的《美国考古学史》中,把美国考古学发展史分为四个连续的阶段,分别是推测期、分类描述期、分类编史期、阐释期,最后阶段始于 1960 年。因此,美国考古学在创造出系统的重要理论来解释考古材料之前,也经历了漫长的酝酿阶段。中国考古学对理论的漠视,可能更大程度上和自己的“证经补史”的学术定位有关。因为拥有漫长而不间断的编年史,考古学者在许多情况下可以从史籍来找到阐释依据与结论,无须通过理论和方法来从无言的物质遗存中来解读其内涵。

值得指出的是,人类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还不到人类历史的百分之一,而文献记载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它们大多是历史重大事件的记录,并不涉及社会诸多方面的基本信息。所以,即使有文献的帮助,考古学家仍然需要自己的理论去解读和提炼文献所没有的历史文化信息。

与中国考古界习惯于把学科的进展以新发现来展示不同,在西方考古界,理

^① 张光直,序言。《时间与传统》,布鲁斯·坎格尔著,蒋祖棣、刘英译。北京 三联书店,1991 年。

论的发展不仅被看作是学科更加科学化的标志,而且被认为是推动学科发展的原动力。20世纪60年代的新考古学变革,就像当时许多学科变革一样,深受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T Kuhn)科学革命思想的感召和影响。库恩在他《科学革命的结构》^①一书中指出:

每一次革命都迫使科学界推翻一种盛极一时的科学理论,以支持另一种与之不相容的理论,每一次革命都必然会改变科学所要探讨的问题,也会改变同行们据以确定什么是可以采纳的或怎样才算是合理解决问题的标准。每一次革命都彻底改变了科学的形象,以至于我们不得不说,那个人们在里面进行科学的研究的世界根本改变了。

加拿大考古学家特里格(BG Trigger 又译坎格尔)分析了库恩科学革命思想对考古研究认识论的影响。他说,有人认为考古学发展经历了一种材料和知识的积累和增长,表现为一种渐变和直线发展的轨迹。考古学的材料库在被持续的扩充,所做的阐释在逐步的提高和完善。这种观点认为,考古学的发展是以材料积累为标志的。但是,另一种观点认为,考古学的进步并不以材料的积累和成功解释而以直线方式发展。相反,人类观念和理论的改变能从根本上改变考古学的阐释,并使学科的侧重点偏离以前那些值得研究的问题。所以,科学的发展是革命性的,它是以否定过去的某些范例来建立全新的研究方向。

特里格还指出,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考古材料在不断积累,新的材料常用来对老材料的解释做补充。然而,采集什么材料以及用什么方法采集材料则受制于每个考古学家认为什么是重要的看法和那个时代的技术手段。所以,考古学家个人的先入之见和专业水准会严重影响考古研究采样和阐释的过程。比如,在碳14和孢粉技术没有发明的时代,考古学家不会去有意采集供年代测定的样品和土壤。而浮选法的采用,为史前经济演变的研究带来了一场革命。新的眼光有时会开创一种崭新的研究途径,比如聚落考古学的兴起,对考古遗址的发掘和勘探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因此,尽管有些考古学家认为考古材料的积累至关重要,但是科学的认识却并不一定如想象那样在同步积累。因此,考古学的发展和进步从某种程度上说并非是以材料的积累和丰富为特点,而是以理论方法的改进和解读信息手段的提高为标志^②。

更为重要的是,在没有特定问题和目标情况下收集的第一手材料,相对于以后有明确目标的研究来说可能已没有用处了。因为解决特定问题所需要的材

^①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

^② Trigger BG *A History of Archaeological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料,往往需要有专门的技术来收集专门的材料样品,进行严格的定性定量分析,以得出观察分析所必须的多种不同测定数据,这在过去为发掘而发掘的材料收集中是完全被忽视或根本做不到的。于是,过去发掘的第一手材料,对于解决后来新产生的问题难以提供必要的观察材料和分析数据。

如果考古学是一门严谨的探索性学科,那么它的学术定位就不能仅仅局限在为史学提供证据,它的实践也不能满足于发现精美文物和失落的文明,它的解释也不能停留在直觉思辨和经验常识的基础上。换言之,如果考古学要成为一门真正的独立学科,就必须建立和发展自己的理论与方法。在西方,考古学的发展确实经历了这样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但是,科学考古学在引入中国后,在许多方面被国学所同化,成为依附于历史学的一个附属性学科,在研究的思维、视野和方法上也深受传统史学的影响。因此,介绍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发展,将中国考古学的历史与现状放到国际的学科发展背景中去加以检讨,显然对于这门学科的发展大有裨益。

本书试图从考古学理论方法发展的国际背景,结合中国考古学引入及发展的特点,介绍这门学科的历史与现状,使我们对这门学科的进展与趋势有一个比较全面和完整的认识。

目 录

前言	1
第一部分 历史与发展	1
第一章 理论与方法	3
1.1 什么是理论	3
1.2 理论与假设	8
1.3 方法与研究艺术	11
第二章 早期古物学	17
2.1 古物、宗教和历史	17
2.2 中国的古物学——金石学	23
2.3 石器与人类的古老性	25
2.4 启蒙运动与人类进步观	27
2.5 古物学的死胡同	29
第三章 考古学的诞生	30
3.1 三期论与相对断代方法	31
3.2 斯堪的纳维亚考古学	33
3.3 三期论与田野考古的推广	34
3.4 旧石器时代研究的发轫	37
第四章 19世纪下半叶的考古田野方法	40
4.1 马利耶特(A Mariette)(1821—1881)	40
4.2 谢里曼(H Schliemann)(1822—1890)	41
4.3 皮特-里弗斯(A H L F Pitt-Rivers)(1827—1900)	43
4.4 皮特里(W M F Petrie)(1853—1942)	45
4.5 伊文思(A Evans)(1851—1941)	46
4.6 小结	47
第五章 进化考古学	50

5.1 旧石器时代的分期	51
5.2 社会达尔文主义	53
5.3 美国的殖民主义考古学	54
5.4 非洲的种族主义考古学	57
5.5 大洋洲的考古学	59
5.6 小结	60
第六章 文化历史考古学	63
6.1 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形成	63
6.2 器物类型学	66
6.3 传播论	68
6.4 柴尔德与考古学的新起点	71
6.5 小结	73
第七章 20世纪文化历史考古学的实践	75
7.1 美国的文化历史考古学	76
7.2 中国的文化历史考古学	78
7.3 俄国与苏维埃考古学	90
7.4 小结	95
第八章 20世纪中叶考古学的进展	98
8.1 考古科技	99
8.2 文化功能观	103
8.3 沃尔特·泰勒的《考古学之研究》	113
8.4 小结	115
第九章 新考古学的兴起	119
9.1 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	121
9.2 新考古学的目标与视野	124
9.3 中程理论与民族考古学	126
9.4 戴维·克拉克的新考古学观	130
9.5 对美国新考古学的批评	132
9.6 小结	134
第十章 新考古学之后	137
10.1 后进程考古学(post-processual archaeology)	138
10.2 象征考古学(symbolic archaeology)	140
10.3 结构考古学(structural archaeology)	143
10.4 马克思主义考古学(Marxist archaeology)	145

10.5 认知考古学(cognitive archaeology)	148
10.6 小结.....	156
第二部分 探索与阐释	159
第十一章 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	161
11.1 历史地位.....	161
11.2 概念与理论基础.....	163
11.3 类型学与器物.....	164
11.4 类型与形制.....	166
11.5 形态与功能.....	167
11.6 分类的品种与操作.....	170
11.7 理论与实践的进展.....	172
11.8 小结.....	176
第十二章 聚落考古学的方法论.....	178
12.1 历史背景.....	178
12.2 概念、目标与方法	180
12.3 聚落研究的层次.....	184
第十三章 埋藏学与遗址形成过程研究.....	192
13.1 埋藏学的概念.....	192
13.2 埋藏学研究的方法.....	193
13.3 动物骨骼破损分析.....	194
13.4 考古动物群数量统计.....	197
13.5 埋藏学与遗址动态分析.....	201
13.6 遗址形成过程研究	202
13.7 个案研究:三峡次生堆积分析	205
第十四章 实验考古学.....	207
14.1 打制石器.....	209
14.2 农业生产.....	212
14.3 食物加工.....	215
14.4 房屋建造.....	217
14.5 巨石的搬运和安置.....	218
14.6 船只与航行.....	220
第十五章 农业起源的理论探索.....	222
15.1 中石器时代与广谱革命.....	223

15.2 人口压力理论.....	227
15.3 “发现论”的反思.....	230
15.4 竞争宴享理论.....	235
15.5 讨论与小结.....	237
第十六章 文明与国家探源问题.....	239
16.1 理论探索.....	240
16.2 国家起源的考古学理论.....	243
16.3 城市起源研究.....	246
16.4 酋邦问题.....	251
16.5 中国文明与国家探源问题.....	256
16.6 讨论与小结.....	262
第十七章 系统论.....	266
17.1 文化生态学与系统论.....	266
17.2 系统论的概念与方法.....	268
17.3 系统论的思维.....	272
17.4 系统论的反思与修正.....	273
17.5 小结.....	275
参考文献	276
后记	283

第一部分

历史与发展

原书空白页